

中国现代资产阶级 哲学

张 儒 义 著

**ZHONGGUO XIANDAI
ZICHANJIEJI
ZHEXUE**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

张 儒 义 著

四川 大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〇年·成都

责任编辑：杨希都

封面设计：李 玫

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1919—1949）

张儒义 编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四川大学内）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市福利印制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9印张 190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5614—0293—7/B·17 定价：3.60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编 “五四”至“一战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	(21)
第一章 “五四”至“一战时期”几次关于哲学方面的论战	(21)
一、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形成的时代背景	(21)
二、新文化运动与思想学术界理论战的发生	(23)
第二章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和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	(28)
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各方的哲学立场	(28)
二、胡适实验主义的哲学体系	(40)
第三章 东西文化论战与梁漱溟的生命意欲主义	(71)
一、东西文化论战与梁漱溟其人	(71)
二、梁漱溟的哲学思想	(75)
第四章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和丁文江的“科学主义”、张君勱的“自由意志论”	(88)
一、“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88)
二、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基本观点	(91)
三、玄学派张君勱“自由意志论”的基本观点	(99)
第五章 曾琦的唯心主义国家主义派的哲学	(109)
一、中国国家主义派的形成与其政治主张	(109)

二、国家主义的哲学基础.....	(118)
第二编 “二战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	(125)
第六章 戴季陶主义的“民生哲学”.....	(127)
一、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及其反动的思想政治纲领.....	(127)
二、戴季陶主义的哲学基础——唯心主义的“民生哲学”.....	(131)
第七章 “唯物辩证法论战”与张东荪的泛架构主义	
哲学.....	(139)
一、“唯物辩证法论战”的概况.....	(139)
二、张东荪的唯心主义“泛架构主义”哲学.....	(143)
第八章 中国的托派哲学——叶青的“哲学消灭论”	
和反辩证法思想.....	(173)
一、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消灭论”.....	(174)
二、反辩证法的机械论和均衡论.....	(180)
三、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认识论.....	(185)
四、“正宗”进化论——庸俗进化论社会观.....	(187)
第九章 中国社会史、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和“新生	
命派”、“动力派”的哲学思想.....	(191)
一、社会史、社会性质论战的基本情况.....	(191)
二、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的基本观点.....	(192)
三、“动力派”在中国社会史、社会性质问题上的唯心主	
义、形而上学观点.....	(201)
第三编 抗日战争和“三战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 ..	(205)
第十章 蒋介石集团的唯心主义“唯生论”和“力行	
哲学”.....	(207)
一、蒋介石和陈立夫的生平、著作.....	(207)
二、蒋、陈的唯意志主义的“唯生”本体论.....	(209)
三、蒋、陈主观唯心主义的“力行哲学”.....	(213)
四、蒋、陈的反动的社会历史观点.....	(216)

第十一章 阎锡山的“中”的哲学	(219)
一、“中”的哲学之世界观	(220)
二、“中”的哲学之唯心主义认识论	(224)
第十二章 冯友兰的唯心主义“新理学”哲学	(227)
一、冯友兰的生平与著述	(229)
二、“新理学”的宇宙观——虚构的理世界	(231)
三、反理性的直觉主义认识论	(236)
四、信仰主义的人生哲学	(241)
第十三章 贺麟的“新心学”或“新儒学”哲学	(246)
一、“没有精神，什么都没有”的唯心主义“新心学”宇 宙观	(248)
二、“自然的知行合一”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	(253)
第十四章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哲学	(258)
一、绝对唯心主义的“自体”论世界观	(259)
二、神秘的“翕辟”说或运动观	(262)
三、“反求实证”的直觉主义认识论	(265)
第十五章 “战国策”派的唯意志主义哲学	(268)
一、“战国策”派反动的政治倾向	(268)
二、“战国策”派的唯意志主义的本体论	(270)
三、“战国策”派的唯心史观	(272)
第十六章 资产阶级中间路线派的哲学思想	(276)
一、唯意志主义的“毋我论”	(277)
二、“天赋人权”的唯心史观	(279)
后 记	(282)

绪 论

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一般泛指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全部资产阶级哲学，我们这里则主要指的是我国1919——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那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尖锐对立的资产阶级哲学。

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我国历史上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我国现代史的第一个大的阶段。这种划分虽然在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这一阶段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未变，仍属近代史范围，不同意划入现代史。我们认为这一阶段虽然社会性质未有根本变化，但由于国内环境所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民主革命必须由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因而它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性质、社会的发展方向变了。它不是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去，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它发展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因此，把这一阶段划归现代史还是比较恰当的。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哲学思想领域来说，一方面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哲学思想的传入和传播，初步运用和形成中国化的科学的哲学体系——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

另一方面也有从西方引来的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它们同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些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结合，拼凑了名目繁多的具有现代色彩的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种种流派。它们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研究和批判这种哲学及其在各种文化形态方面的恶劣影响；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我们党十分重视的思想战斗任务。

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总的说来，是代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的。它们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多次挑起哲学思想方面的论战，并在许多情况下，利用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权力量，压迫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和革命人民，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从“五四”时期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到蒋介石集团离开南京逃往台湾的各个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哲学，就其主导方面而言，都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立的。这种哲学在理论上之所以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相容，从其理论本质来说，是由于它集中了中外古今最腐朽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几乎无任何进步性可言。它同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工人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是难以匹敌的。它的思想来源主要是：（1）中国封建时代地主阶级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特别是我国后期封建社会即宋明以来形成的唯心主义理学、心学思潮；（2）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反理性主义各流派的落后和反动的思想，如披着科学外衣宣扬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妄想调和科学与宗教的矛盾的新天主教——基督教思想等；（3）利用和歪曲我

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如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孙中山哲学中的机械论和二元论之类。

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时间虽然不长，只有30年左右，但呈现着极其复杂的情形。过去一般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分期，把它划为五个阶段：即“五四”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下简称“一战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下简称“二战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抗日战争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下简称“三战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这种把哲学与历史同步的传统划分方法，虽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基于一定政治环境而且最终根源于社会的经济条件之中。但我们认为上述划分方法，又有忽视哲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的缺点，因为哲学的发展，并非与政治经济的变化发展、与革命的发展完全同步的。哲学的发展，至少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继承性。世界近代史上，经济上先进的英法，并没有产生康德、黑格尔那样有影响的哲学，而经济上稍次，资本主义还未充分发展的德国，却产生了康德、黑格尔那样深邃的思辨哲学。其原因就是德国自中世纪以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偏重思辨的传统，和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软弱的然而又要急速发展的特定历史条件。德国的哲学当时是高于各国发展水平的。

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由于受中国封建传统的束缚牢固，也由于中国当时社会动荡急剧，没有很多时间消化从西方贩来的东西，因而表现出浅薄、散乱和腐朽。它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虽是基本的，但时而互相火拼。就其发展

形态来说，仍有其相对独立性，不必完全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分期划分阶段，在我们看来，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出现过三种基本形态，或者说有其发展的三步曲吧！

从“五四”到“一战时期”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资产阶级哲学的基本形态，主要是从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出发的杂有机械唯物论成分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经验论。“二战时期”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一方面是哲学战线很奇特的活跃时期；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趋向绝对主义，资产阶级哲学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唯心主义的绝对主义。抗日战争和“三战时期”，是我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基本形态是唯意志主义的行动主义。

在第一阶段，登台表演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是比较多的，有胡适派的实验主义，梁漱溟派的生命意欲主义，张君勱的“自由意志论”，丁文江派的科学主义（实即马赫主义）和曾琦的唯心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新天主教——基督教哲学等等。这时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派别虽然很多，但主要的或起主导作用的哲学理论倾向，则是我们前面已提到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经验论。这种经验论集中表现在对待中西两种文化的态度上，只注意形式主义地观察和研究问题，它们在考察中国和西方文化时，只注意形式，而忽视内容，只注意片面的或表面的现象，而不关心本质，凭形式经验现象当作实在，当作世界的本质，并对作为哲学概念的“经验”。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因而歪曲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得出了许多极其片面和错误的结论。试以当时胡适派的实验主义和梁漱溟的生命意欲主义这两种似乎很对立的哲学派别为例，我们可

以很明显地看出其形式主义地观察问题的方法和把经验当作实在的哲学倾向。胡适的实验主义，是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杜威那里贩运进来的，当时有人称为“唯用主义”。这种哲学，以“科学”和“民主”作旗号，崇拜西方“文明”，提倡“全盘西化”，鼓吹社会改良论，抵制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思想的传播；而宣扬生命意欲主义的梁漱溟，则以法、德生命哲学为基础，揉合我国封建时代的儒家哲学、印度佛教哲学的许多观点，强调坚持所谓“东方固有文明”，排斥西方的所谓“物质文明”，也反对中国走“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线”，是具有一种复古主义特征的唯心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然都是资产阶级哲学，但在当时是相互排斥的，并在20年代初还进行过著名的“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然而这两派资产阶级哲学的基本观点，却又都是以形式主义的经验论的认识论作理论支柱的。

胡适从实用主义的“经验=实在”的基本观点出发，以“经验”的无所不包或“兼收并蓄”，论述了“实在”的复杂性质，同时他把“经验”与人紧密联系起来，认为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种种反动”，即人的作用，就无所谓客观世界。以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西方文明，他认为“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和“充分承认物质的享受的重要”，是“利民厚生”的文明（转引自钟离蒙、杨凤麟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五册第255页，下引简称《资料汇编》）。胡适认为西方的“利民厚生”的文明，不只是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不过这种精神文明的“第一特色是科学”（同上），反对和驳斥了梁漱溟派所谓西方文明的观点仅仅是物质文明的观点。总之，在胡适看来，

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西方的月亮也比东方的圆，于是要求实行所谓“全盘西化”，认为中国只有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才有出路，甚至主张要把中国打扮起来嫁给美国，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因而他极力贬斥我国固有文化，即使后来他搞整理“国故”，据其自供，也是为了把中国之“丑”暴露给外人，是要“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使人们知道中国的“国故”“不过如此”（同上267页）。在他看来中国的文明是完全落后，简直没有一点积极的东西。他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全是祖宗造的“孽”。这说明他对待东方文明持的是全面否定的态度，而对待西方文明则又全面肯定。与此相反的梁漱溟则又走的是另一极端。他是全面否定西方的所谓“物质文明”，而要坚持所谓“东方固有文明”即所谓“精神文明”。他认为精神文明是人类进化的高级阶段，它比之西洋的所谓单纯的物质文明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向西方学习。他的这种观点，表面看去，与胡适大不相同，但从其哲学基础来看，从其观察问题的思想出发点和方法来看，我们认为和胡适一样的，都是唯心主义的形式主义的经验论。他同胡适一样认为世界——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都是人的主观精神（“意欲”，“不知足”等）的种种表现。梁漱溟强调的主观精神——“意欲”即是生活亦是生命，而生活不是别的，只是以意欲为基础的一事一事的“相续”，或是“连续的涌出不已”的一问一答。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意念，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有多少生活现象，因而也就有什么样的世界。因此，他认为文明只要向内用功夫就行了。现实的事物的性质和意义，完全是人的主观经验和神秘的直觉添加上去

的，而东方文明或中国文明，其所以无比“优越”，就在于有这种向内求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调和”思想，就是这种文明的结晶，它好似生命或意欲之树上开的大鲜花，谁要是否定了它，就否定了中国民族文化，简直是非圣无法，不配作中国人。可见他对中国的封建文化采取的是无分析的全盘肯定的态度。他同胡适是各执一端，胡对西方文化全盘肯定，而且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梁则相反，全盘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并又全盘否定西方文化。这说明在具体问题上两者是十分对立的。但从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看，则又是沆瀣一气，同出一元的。

从哲学的基本立场或态度看，胡、梁二派都是出于主观唯心主义的形式主义经验论。这种经验论的基本特点，就是以主观感觉现象或感觉经验来代替客观事物，以形式上的否定或肯定代替对客观事物本质或内容的科学分析与评价，而其哲学的归宿，已既非西方哲学中具有完整意义的任何经验论派别，也非中国古代朴素经验论可比了。在方法上他两各只抓住东西文化中的某些片面现象，有些还是主观夸张了、歪曲了的或者是主观浮想的现象作为论断的依据，因而只能得出脱离实际的结论。他们在对待外来文化和本国文化上，都表现了极端主观、极端片面、极端形式主义的态度，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它唯心主义的形式主义经验论。这种经验论，从“五四”到“一战时期”，在我国思想界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它渗透到我国文化思想形式的各个方面去了。就是当时进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受了它的影响。当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刚刚传入中国不久，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阶段，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学习和运用还仅具有初步性质。因而对古代的和当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不能认为是全面的彻底的，也存在形式主义的缺点。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种“资产阶级的方法”，从哲学基础看，我们认为就是上述形式主义经验论的影响。经验论，无论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经验论，它在认识方法上都同形式主义有密切联系。形式主义能够成为当时中国的一个影响广泛的思想方法，诚然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但就思想原因来说，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古代传统的直观经验方法和外来的形而上学机械认识方法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和没有掌握好真正的科学方法，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了解和接受，还比较间接和零碎，没有系统地深入地进行研究，因此还不能彻底同资产阶级哲学划清界线。就是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党的当时的领导人陈独秀也是这样。他甚至声称实验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行不悖”。在哲学上或世界观上，不能同资产阶级决裂是后来陈独秀等人导致机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因素。

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在“二战时期”形成的唯心主义绝对主义，到了“二战时期”，在资产阶级哲学领域，形式主义经验论的主导地位发生了变化。“二战时期”，是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人民在共产党教导下，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激烈搏斗的时期，阶级斗争异常尖

锐，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十分鲜明，双方都难以容忍折衷调和，搞所谓“中庸之道”。显然，那种“兼收并蓄”的，即表面上似能容纳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形式主义经验论，是难以适应地主资产阶级的需要了。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形式主义经验论的主导地位，逐步让给唯心主义的绝对主义了。“二战时期”，虽然形式主义经验论仍有流传，而在资产阶级哲学领域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具有绝对主义特征的唯心主义，张东荪的“汎架构主义”和“戴季陶主义的“民生哲学”、“人性论”。这些都是具有绝对主义特征的唯心主义哲学。此外以叶青为代表的托派机械论哲学，陶希圣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亦都具某种绝对主义的特征。

张东荪和戴季陶可以说把“五四”以来的形式主义经验论、形式主义的认识方法发展到了极端。张东荪依据西方的新康德主义，把世界的本质，仅仅看成是思想“架构”，并在认识论方面，把新康德主义的相对主义发展成绝对主义。这同西方的新康德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即一部分新康德主义者逐步接近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西方新康德主义发展的第三时期，突出的强调了先验原则和思维逻辑框架的意义。张东荪的“汎架构主义”，还利用了著名生物学家摩尔根的《动物生活与聪明》一书中的许多非科学的先验思想：如说实体并不存在，世界只是先验的思想框架和逻辑条理决定的等等观点。张东荪以之为依据，说“外界只是空的架构”（张东荪：《认识论》第127页）。并把“架构”说成是绝对不变的。他认为这种绝对不变的“架构”或“条理”，就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它如同西方

哲学史上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的所谓“道”，宋明理学家们的“天理”，世界不管如何变化，唯独此“空的架构”绝对存在。很明显，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绝对主义，而非西方早期和中期的具有相对主义特征的新康德主义了。

戴季陶的“民生哲学”和“人性论”，虽创于“一战时期”，但盛行和作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官方哲学，则主要在“二战时期”。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发动的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就是以所谓戴季陶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戴季陶利用孙中山“民生史观”的二元论性质，把“民生”、人的“生存欲望”抽象化、绝对化、神秘化、使之成为超社会超历史的东西，并把它作为历史的中心。又借助于外国生命哲学和中国古代以天命论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学说，炮制了人性天生和人性不变的“新”理论。他盗用孙中山的名义，说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同自己的“民生哲学”、“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思想”、必须“把一切科学的文化，都建筑在这种仁爱的道德基础上面，然后世界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见戴季陶：《孙文主义哲学基础》）而不顾孙中山对“仁爱”等传统思想内容的改造和注入的民主革命内容。在戴季陶看来，既然“仁爱”等道德思想是建筑世界的基础，并且又是“人类的生性”，因此它是永恒的。

张东荪和戴季陶的这两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绝对主义哲学，在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哲学领域，是占统治地位的，尤其是后者，由于蒋介石集团利用政权的力量大力宣扬，并引以为工具，打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派别的哲学，因而在

哲学、政治思想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从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六年，我国学术界发生的多次论战，在哲学上来说都有反对或拥护这种唯心主义的绝对主义的内容和意义。

这一时期的绝对主义，从其世界观的基点看，就是把本来属于后天的第二性的经验的东西变成先验的东西，并使之永恒不变，而在思想方法或认识方法上的特征，就是要使客观的东西去适应主观先验的东西，把表面的或片面的东西绝对化，对表面的非本质的东西作违反科学的抽象，使之成为“神圣”，它同黑格尔主张深入本质，而本质又是含有辩证法成分的那种绝对主义不同，它具有极端形式主义性质，简直可以称为形式主义的绝对主义。它对中国的的一个重要危害，就是被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或者是用形式的机械的比拟，而得出许多反革命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从思想上讲，虽然主要的是受国际的影响但同国内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绝对主义哲学思潮也不是没有关系的。教条主义忽视马克思主义正确地灵活地运用，同张东荪的“架构”万古不变论就有一定的思想联系，教条主义的关门主义，就是戴季陶绝对主义的“排他性”的一种折射。

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即抗日战争和“三战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这个阶段由于蒋介石集团盘踞国家的中央政权，幻想以他们的意志统一中国，大力推行唯意志论的行动主义哲学，使得学术领域出现大量反理性思潮。蒋介石本人的所谓“力行哲学”和陈立夫的“唯生论”哲学，在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领域居于支配地位，是官方哲学。另一些资产阶级哲学派别，也大多是直接和间